

# 历史话语何以有用？ ——从文化遗产探索批评话语分析的文化路径

侯松<sup>1</sup> 吴宗杰<sup>2</sup>

(1.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2.浙江大学,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 文化遗产越来越被理解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其中,批评话语分析(CDA)理论方法的跨学科推动作用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旨在引导中国 CDA 学者介入遗产话语研究,并藉此探索具有历史文化厚度和本土批评精神的 CDA 文化路径。文章提出以历史文本为主要资源,以反思当下为基本目标,以儒家话语批评智慧为路径导向的 CDA 研究,通过解读被全球化思维淹没了的历史声音,消解当下主流话语的权威性,促进多元文化话语的对话。以“城西旧楼”为个案,论文展示了这一研究路径的运作及其在中国遗产话语反思与本土重构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 话语;文化遗产;批评话语分析;文化路径;历史文本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5)03-0047-06

DOI:10.13978/j.cnki.wyyj.2015.03.010

## 0. 引言

近年来,批评话语分析(CDA)开始突破既有的社会问题导向,对历史书写、文化记忆的关注不断增多(Heer et al. 2008; Martin & Wodak 2003; Richardson et al. 2013; Part 1),但在历史与文化记忆交织作用的文化遗产领域却鲜有话语研究者的身影。与此形成反差,语言表征、知识生产、社会建构等话语问题早已是遗产研究中的热点议题。话语分析,特别是 CDA 的理论方法在遗产研究界越来越受重视,作为一个新兴交叉领域的“遗产话语研究”也逐渐成形(侯松,吴宗杰 2013)。本文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推动 CDA 学界积极介入遗产话语研究,以进一步增强 CDA 的跨学科活力,提升其历史文化厚度<sup>①</sup>;二是通过具体的遗产话语研究,探索中国 CDA 的文化路径。

同诸多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一样,CDA 的全球实践引发了一些跨文化反思(Chilton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1; Shi-xu 2009; 施旭 2010),探索 CDA 的本土文化范式与学术路径也成了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田海龙(2008)认为,中国的 CDA 研究不应照搬西方的“锐角”批评模式,而应走“钝角”批评之路,关注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基于对西方话语分析的研究,特别是 CDA 的批判性考察,施旭(2010)倡导以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及其话语方式为基础的“文化话语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路数。丁建新、沈文静(2013)则主张“边缘话语分析”,重点关注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声音,实现从语言批评到文化

批评的转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如熊沐清 2001;吴鹏,王海啸 2014),但就本文而言,吴宗杰、侯松(2012)所讨论的中国 CDA 的超学科与跨文化转向是需要特别提及的。基于对中国地方文化遗产话语重构的研究,他们提出以“春秋笔法”为基本精神,以“微言大义”“述而不作”“兴灭继绝”等传统话语智慧和历史思维为指导的话语批评研究。本文希望继续沿着这样的文化路向进发,以文化遗产话语研究为载体,探讨 CDA 的本土路径,主张以历史文本为主要资源,以反思当下为基本目标,以儒家话语批评智慧为路径导向的 CDA 研究。

## 1. 作为话语的遗产与遗产话语研究

遗产并非纯粹过去,而是当下面向过去的一种话语建构,这一点在国际遗产学界已有广泛共识,话语研究者要进入文化遗产问题的讨论,这也是其基本理论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遗产的话语属性进行简单的理论探讨,并对遗产话语研究的相关文献做概要性的梳理与回顾。

遗产是一种社会表征和话语实践,这主要体现在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其一,遗产存在于话语之中,在话语中获得意义。遗产的存在(方式)是在相关的表征与言说中建构起来的,这些表征和言说规定了遗产的内涵与外延,塑造了与之相关的知识、概念、理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进而影响乃至决定人们对遗产的行为和实践方式(Brett 1996; Smith 2006)。其二,遗产言

\* 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话语学视域中的文化遗产:以浙西为中心的考察”(编号 ZC304015007)和浙江省社科联课题“浙西城市遗产的本土话语研究”(编号 2015B089)的阶段性成果。

说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与各种复杂的因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操控遗产言说的内容与形式,即关于遗产什么/谁可以说,什么/谁不可说,用何种方式说,所说的如何传播,如何被解读。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源于欧洲的“遗产运动”迅速蔓延,最终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文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与西方现代历史观、思维逻辑以及中上层白人志趣紧密结合的原真性(authenticity)、物质性(materiality)、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等概念不断得以强调,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普世价值”不断被凸显,建构起文化遗产的标准样态与基本表述方式。Smith(2006:Chapter 1)称之为“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AHD)。正如她所指出的,AHD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及其分支机构公约、宪章与指导原则中,并渗入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相关法律与文化政策之中(Smith 2006; Waterton 2010),从而具有无可挑战的权威性。不仅如此,AHD还通过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专家话语的结合获得了真理性。它总是在专家学者(考古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史学家等)的专业化言说中出场,似乎总是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因而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这样的话语实践背后总带有各种各样的“遗产政治”(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等),或隐或显地在遗产实践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Lowenthal 1998; 李春霞,彭兆荣 2008; 彭兆荣 2008)。

遗产的话语属性及其文化政治,在借助话语分析,特别是CDA方法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展现,学者们从语言符号使用的细节中洞察到了遗产建构背后的知识操控与权力运作。Emma Waterton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2006年,她与同事首次将话语分析方法引入遗产学界。以澳大利亚的《巴拉宪章》(Burra Charter)为例,她们通过对语词选择(wording)的批判性考察,指出了其遗产建构中所倡导的“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价值观并未得到实质的体现(Waterton et al. 2006)。借用CDA中的多模态分析法,Waterton(2009)还考察了英国遗产旅游宣传中的图片表征。她发现,其中所呈现的遗产几乎总是宏大的、久远的、具有突出艺术性的遗迹,所在地总是一片悠闲、和谐的景象。此外,遗产的物质形态总被置于视野的中心,而人则很少出现,即使有,也总是专家技术人员或受教育的孩童,他们往往被呈现为

被动的接受者,并不进入遗产意义协商的过程。这样的视觉表征与AHD正好是一致的。Waterton(2010)是目前为止最系统的遗产CDA研究专著,重点考察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遗产政策话语。通过对不同阶段遗产政策文本及其产生过程的话语分析,她进一步揭示了看似科学、公平、合理的知识体系背后隐藏的遗产价值观、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即使是新世纪倡导的遗产“多元文化主义”,也只是为国家认同服务的,超越这一界限,差异与多元性就被遮蔽起来。

在遗产话语分析研究方面,中国学界并不滞后。李军(2005)运用Foucault(1972)的话语分析方法——知识考古学考察了“文化遗产”概念的产生与演变过程,指出文化遗产是一种话语制造,其背后隐藏着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比上述Waterton等人的遗产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还早。李立(2010)呈现了贵州屯堡的乡村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村志书写、学术话语以及人类学家与乡村精英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通过田野资料的呈现与话语分析,遗产知识生产与地方实践过程中的经验与想象,博弈与共谋被揭示出来。可以说,这是“民族志导向型话语分析”(ethnographic-based discourse analysis)在遗产问题应用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尝试。侯松、吴宗杰(2012a)主张将话语分析应用到遗产本土话语及其意义挖掘的相关研究中,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时代方志所载“文昌殿”的个案分析,集中展现了中国本土遗产言说与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由此,他们认为关注中国本土历史话语,从而推动遗产话语的跨文化对话是迫切需要的。

整体而言,遗产话语研究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已呈现出多元推进的良好态势。目前来看,遗产界的学者是主力军,话语研究出身的学者还很少。由于语言学功底的不足,遗产研究者的话语分析多集中在词汇语义层面,他们对其他文本特征的敏感性与阐释能力显得颇为不足。可以想见,CDA学者一旦介入,不仅能丰富遗产话语研究的分析手段、操作方法,还能有效激发两个研究领域的双向互动,推动跨学科对话。就本文而言,文化遗产不仅是CDA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领域,它同时也可以为中国CDA的文化路径探索提供实质性的文本资源和操作平台。

## 2. 中国遗产话语反思与CDA的本土路径探索

作为话语实践,遗产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言说与建构理当有所差异。中国素有“崇古”、“好古”的

传统,对于历史与文化遗产,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思维、价值思考和话语方式。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摆脱全球“遗产运动”的话语控制,它所生产的概念、知识、价值都已内化为我们自己的真理与标准。Waterton (2010:50-52)对《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批评话语分析便是从一个侧面的极好说明。

面对全球遗产话语及其带来的文化政治,中国的CDA学者也当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既有的CDA研究方法,考察中国遗产话语实践中的问题,为遗产反思贡献力量。毕竟,与遗产研究界的学者相比,我们有更敏锐的语言意识,更丰富的话语分析经验,更多元的分析策略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中国遗产话语反思研究中探索具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话语批评进路,推动CDA的多元文化发展,而这正是本文要尝试的。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CDA面临许多挑战,如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Shi-xu 2009,施旭 2010),其批判意识缺乏跨文化思考(Chilton et al. 2010,Zhang et al. 2011)等。在中国的历史文本中,我们或许能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文化智慧。这里我们来看《论语》中的一段对话带来的启迪: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杨伯峻 1980:139)

在以上对话中,孔子并未直接否定叶公对“直躬”的理解,或者说“直躬”话语在叶公身上的体现,而他的应对显然带着对叶公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不是针对话语策略的解构,也不是对其背后价值观、思维逻辑的揭示,孔子只是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和价值观,或者说一种不同的话语。有意思的是,这里两种话语都被限定在“吾党”范围之内,如果将“党”(古时五百家为一党)理解为一个文化社区,这两种文化话语的简单并置就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对话。由此,我们对“直躬”的思考可以走向多元的、流动的阐释空间。具有反思意识的人们可能会问:我(的文化)是如何理解“直躬”的?不同的他者(文化)对此还有多少不同的理解?他们又将如何丰富我(的文化)对“直躬”,乃至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如此,解构与建构、批判与启迪、他者与自我的融合在具体的反思中得以展开。

借鉴《论语》中的话语智慧,中国的遗产话语反思可以将目光转向西方AHD的文化他者,通过对他者文化话语的呈现和解读,走向多元文化对话。正如孔子的“吾党”一样,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他者。将中国本土的遗产话语与AHD并置对比,既是对边缘文化声音、思维逻辑和价值观的展现,也是面向全球化遗产保护的反思,它启发多元的、因地制宜的遗产(话语)重构。要寻找中国本土遗产话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重读前现代的历史书写(侯松,吴宗杰 2012a,b)。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先人留下的史志谱牒浩如烟海,它们不仅是提供历史信息的史料,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看,也是理解中国本土历史思维、遗产思维的文本资源。呈现这些文本,解读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特别是其与AHD的差异,不仅能有力消解普世化遗产知识的真理性与权威性,还能为中国遗产研究与实践的本土化转向打开思路,为世界遗产的多样化贡献中国力量。遗产保护与话语批评的应有之义也都在于此——前者旨在维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后者旨在揭示和打破知识与文化建构背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促进对世界的多元化理解。

### 3. “城西旧楼”:一个案例分析

以下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遗产话语案例分析来展示上述的CDA路径,这一案例源于我们主导完成的一个街区遗产研究项目,即浙江省衢州市水亭门街区的一处古迹“城西旧楼”。我们以清嘉庆《西安县志》<sup>②</sup>中的“城西旧楼”记载为语料,通过话语分析来展示其文化言说方式及其背后的中国传统遗产思维。我们注意到,Tuen. A. van Dijk等人特别强调话语分析研究语料要有量上的可靠性<sup>③</sup>,但Norman Fairclough(1992,1993,2000)通常只是基于一两个小文本展开分析,回到Michel Foucault(1972,1977)那里,话语分析的语料更是零散的,没有量上的系统性。本文的分析无意展示中国本土遗产话语之全貌,因而也不必对研究语料的量有过多的追求。对我们而言,聚焦于一个文本,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分析思路和操作过程。

“城西旧楼”文本抄录如下:

**城西旧楼**〔王世懋二酉委谭〕衢州城西层楼下,临衢水,颇称壮丽。上有四大字云:飞阁流丹。余刻一诗而去。〔王世懋游城西旧楼诗〕雨合烟霏望不穷,层楼百尺似浮空。清迷橘柚寒山外,白点鸥鳧细浪中。游目岂须吾土贵,赏心偏为故人雄。不知醉后题姑篾,可得东阳八咏同?〔徐之凯初学集·白晖山夫子于晷

中麟洲先生游郡城西楼诗碑·偕友人属和诗]忽窥珠玉莓苔下,如见登临烟雨中。<sup>④</sup>

对古汉语文本进行话语分析,我们不能照搬源于西方的分析模式和框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既有的分析方法都应该摒弃,只是任何挪用都须有跨文化的思考。我们的做法是:以话语分析的基本研究问题为出发点,即文本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是以何种方式说的?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起作用?从语料中寻找较凸显的内容/语言特征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侯松、吴宗杰 2012a:23)。以下我们从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两方面着手,分析解读“城西旧楼”记载背后的意义空间和文化思维方式,展现其与 AHD 的差异,实现跨文化的话语批评与反思。

### 3.1 “人”、“文”关照下的遗产意义空间

从全球化的遗产视角来看,城西旧楼应理解为建筑物,可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西安县志》将它放到“古迹”的范畴中记载。“古迹”这一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记忆方式与文化遗产理念。从言说内容上看,对这一古迹的记载包括四个部分:

- 1)所处位置与整体气势描述(“衢州城西层楼下,临衢水,颇称壮丽”);
- 2)楼中文字记录(“上有四大字云:飞阁流丹”);
- 3)王世懋刻诗一事及其诗文记录(“余刻一诗而去。……”);
- 4)其他相关诗句记录([徐之凯……]……)。

正如侯松、吴宗杰(2012a)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古迹”话语关注的重心不在于物质遗存,“城西旧楼”书写中找不到今天建筑遗产工作者所关注的面积、高度、格局、用材、艺术风格、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陈述。这里不妨拿衢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中所录的“周王行宫”作个对比分析,该表中的周王行宫简介是这样写的:

该建筑位于府山街道县学街社区柴家巷 24 号,坐西朝东,三间两搭厢,单层楼结构。建筑面阔 10.066 米,进深 10.188 米,面积 106.3 平方米。北侧有翼房一间。硬山顶。明间五檩二柱,次间五檩三柱。据当地老人介绍,此处为每年庙会周宣灵王塑像在此临时停留并祭祀的场所,因此称为周宣灵王行宫。是一处典型的浙西地区坛庙祠堂古建筑。该建筑从其建筑风格及雕刻艺术判断为清代建筑。

我们看到,这里最为关注的是周王行宫作为建筑遗产物质层面的信息,AHD 对物质性、原真性的强调在此发挥了话语规范的作用。换个角度来说,AHD 宣

扬的科学的、美学的普世遗产价值也需要落实到建筑物本身的物质性考察。由此看来,当代遗产专家为何如此注重记录周王行宫物质性方面的细节,也就不难理解了。

传统方志中的“城西旧楼”书写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关注点。从以上的内容分析来看,它主要集中在“人”、“文”两个方面。除了对位置和整体气势的简单描述,其记载都是与城西旧楼相关的人事与诗文,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从根本上说,诗文亦可理解为人事:一方面诗文皆出于人手;另一方面,其所言也都是人事、人志与人心。这些构成了城西旧楼作为古迹或者文化遗产的意义来源。正如《河南通志·古迹上》小序所言:“上古之君子,德泽加于民,名声流于时,匪独垂竹帛炳丹青而已也。其生平所经历与钓游处,往往使人凭吊流连而不能去,岂非以其人哉?”<sup>⑤</sup>也就是说,从中国传统话语的角度看,城西旧楼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历史上与之相关的“人”与“文”,而非其物质本身。作为古迹,它寄托的是人志、人心,以此诱发面向过去,面向贤德的怀古之思与凭吊之情。无论是“飞阁流丹”这样大气灵动的题字,还是“游目岂须吾土贵,赏心偏为故人雄”的志气与情趣,抑或“不知醉后题姑蔑,可得东阳八咏同”,“忽窥珠玉莓苔下,如见登临烟雨中”的古今相感,都挑动着后人思考、感悟、回味历史的情愫。在这样的“人”“文”言说中,不需要运用某一(些)学科的知识来为过去定性,衡量它有哪些方面的价值。或者说,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不依赖于理性的、逻辑的演绎,它是流动的、开放的,在古今心灵的通感中得以生发。

### 3.2 语言原真性

从言说方式上看,“城西旧楼”书写最显著、最令今人不可思议的特征是全篇皆为转引。整个文本由王世懋《二酉委谭》中的一个片段、王世懋《游城西旧楼诗》和徐之凯《初学集·白晖山夫子于署中麟洲先生游郡城西楼诗碑·偕友人属和诗》中的一句组成,找不到纂修者自己的语词。重读中国传统史籍志乘,不难发现古人对过去的语言怀有特别的尊重,前代的文本不断被抄录重写,后世的文本再层层叠加,由此,历史总是在一个多时代、多层次、多维度的文本体系中建构自身。清代学者章学诚(1985:125)曾言:“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吴宗杰、余华(2011)在分析《史记》叙述范式时将这一传统历史言说方式总结为“语言碎片来源的原真性”,将其移植

到遗产言说方面,则简称其为“语言原真性”(吴宗杰 2012;侯松,吴宗杰 2012a,b)。使用过去的、原真的语言书写遗产,其意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以及古今对话的可能性可以有所保障,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智慧也在于此。通过“城西旧楼”文本的转引,原真的历史语言被带到当下,人们可以藉此理解明代文士王世懋、清代衢州贤达徐之凯对这一古迹的看法,理解他们如何面对过去留下的遗迹,如何将之与先代贤德发生关联,建构古今的汇通。通过这样的书写,人们还可以理解清嘉庆《西安县志》纂修者对城西旧楼的意义把握,理解其面向遗产的记忆方式。以语言原真性为基础,不同时代的文本碎片在这里并列累积,构成了多元理解、多元对话的广阔空间。

这与当代遗产话语的言说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上文的周王行宫简介为例,它的语言都是当下的,源自于当代的遗产工作者,其可靠性建立于他们对遗产物质遗存的专业性、科学性考察之上。这样的言说被认为是客观的、准确的、无歧义的、超历史的,如此一来,遗产也就变成了无历史的,“另一时空人们的言说与理解被淹没在当代的语言之中”(Duara 1995:48)。全球化遗产话语霸权之根源或许正在于此,它倡导的历史保护与记忆方式同时不断地遗忘,将历史的、本土的话语删除,留下的只有面向过去的当代话语建构。

原真性是遗产界最关心的议题,中国传统以语言为基础的遗产原真性思考与源于西方的原真性概念也构成了有意义的对照和对话。在 AHD 框架中,原真性不可能脱离物质层面考察而得以确立,中国历史传统对遗产原真性的思考将语言置于最核心的位置来对待,这一差异实质上体现了东西方对遗产意义来源的不同理解:前者认为意义是内在的,存在于物质本身,后者则认为意义是人通过语言赋予的。这也导致了遗产保护方式的不同,前者试图尽量保护、保存遗产的物质形态,将其视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而后者则特别注重语言的记录与保存,因为有了语言的真实,才有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千百年来,中国人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 4. 结语

CDA 一直高举“跨学科”这面大旗,它与历史书写、文化记忆,特别是遗产研究的结合体现了其跨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值得学界关注。当今中国,文化遗产已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它关乎传统文化复兴、社会道德重建、城乡统筹发展、文化产业腾飞

等诸多重大问题。既然它是一种话语实践,CDA 学者在这一领域当是大有可为的。那么,我们当如何介入遗产话语研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视角、什么样的文本语料,如何展开具体的分析与解读,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必然也是对 CDA 文化路径的探索。本文借鉴《论语》中的一段对话给我们带来的话语批评智慧,以呈现本土历史文本,解读其背后意义空间和文化思维方式为研究进路,展现其与普世化权威话语的差异,寻求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批评与重构的双重使命。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 CDA 研究能够更好地体现话语批评的本义。话语作为面向世界(或其中某一方面)的某种言说和理解方式(Jørgensen & Phillips 2002:1),系统地建构其言说的对象,塑造相关的知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Foucault 1972:49;Fairclough 1992),其根本问题不在于语言形式本身(如名词化)<sup>⑥</sup>,而语言运用背后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价值立场、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偏向性才是话语批评的真正目标。也就是说,CDA 研究并不是要让人们不用某种语言形式说话,而是挑战、解构语言符号运用背后的单一思维和意识形态建构,促进面向世界的多样性、流动性、开放性理解。

有学者或许会说这样的研究路径更像是“积极话语分析”(PDA)。我们认为,批评与积极的简单二元对立需要被超越。CDA 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虽然很多研究给人这样的印象,PDA 也并非没有批评,对某一话语的肯定与赞赏同时必然是对其对立面的批评。本文倡导的 CDA 文化路径汲取了《论语》中的话语批评智慧,批评不再是否定和解构,而是对文化他者的呈现和解读,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超越,促进多元文化话语的对话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为我们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这些看似“过时”甚至“死去”的历史和历史语言并非与当下无关,它们可以是反思与重构的有力武器。在全球化不断吞噬世界多元图景的今天,过去的话语碎片尤为珍贵。一定意义上说,它们也是需要保护和利用的文化遗产。激活历史话语,让它们对当下说话,这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批评实践。孔子当年删诗修史,正是利用过去的文本实现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批判与重构。我们相信,带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话语智慧不断探索,我们的 CDA 研究一定能焕发出特有的魅力,成为国际学术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注释：

- ① 参见 Blommaert (2005: 37) 对 CDA 缺乏历史性的批评性讨论。
- ② 古西安县今属浙江省衢州市,民国时改名衢县。
- ③ van Dijk 主编的 *Discourse & Society,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偏好基于一定量语料的话语分析研究稿件, 见其个人网站 <http://www.discourses.org> 上这三种期刊的收稿偏好说明(Criteria for Preferred Papers)。
- ④ 清嘉庆《西安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554 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粗体、字号大小区分与原文一致。
- ⑤ 见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卷五十一 标点、粗体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
- ⑥ 见 *Discourse & Society* 2008 年第 6 期中 Michael Billig, Norman Fairclough, Teun A. van Dijk, J. R. Martin 4 人关于 CDA 语言使用(主要是名词化)问题的辩论。

参考文献：

丁建新 沈文静. 2013. 边缘话语分析: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4):17-21.

侯松 吴宗杰. 2012a. 话语分析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解读——以衢州方志中的“文昌殿”为例[J]. 东南文化(5):21-27.

侯松 吴宗杰. 2012b. “古迹”与遗产政治的跨文化解读[J]. 文化艺术研究(1):1-8.

侯松 吴宗杰. 2013. 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 理论·方法·展望[J]. 东南文化(3):6-13.

李春霞 彭兆荣. 2008. 无形文化遗产遭遇的三种“政治”[J]. 民族艺术(3):7-18.

李军. 2005. 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J]. 文艺研究(4):123-131,160.

李立. 2010. 在学者与村民之间的文化遗产——村落知识生产的经验研究、话语分析与反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彭兆荣. 2008. 遗产:反思与阐释[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施旭. 2010. 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田海龙. 2008.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J]. 外语教学与研究(5):339-344.

吴鹏 王海啸. 2014. 当代西方话语研究述评与本土化反思[J]. 现代外语(2):261-269.

吴宗杰. 2012.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重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28-40.

吴宗杰 侯松. 2012. 批评话语研究的超学科与跨文化转向——以文化遗产的中国话语重构为例[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12-16.

吴宗杰 余华. 2011. 《史记》叙事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0-77.

熊沐清. 2001. 话语分析的整合性研究构想[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15-19.

杨伯峻. 1980.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姚宝燮(清)等修,范崇楷(清)等纂. 1970. 西安县志[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章学诚(清). 1985.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tt, D.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M].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Chilton, P., H. Tian & R. Wodak. 2010. Reflections on discourse and critique in China and the West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4):489-507.

Duara, P.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History from Modern China*[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Fairclough, N. 199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The universities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2):133-168.

Fairclough, N. 2000. Discours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f welfare reform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163-195.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tr. A.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tr. A. Sheridan. London: Penguin Books.

Heer, H., W. Manoschek, A. Pollak & R. Wodak. 2008.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Remembering the Wehrmacht's War of Annihilation* [C].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Jørgensen, M. & L. Phillips. 2002.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owenthal, D. 1998.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2<sup>nd</sup> ed.)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 R. & R. Wodak. 2003. *Re/reading the Past: Crit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s of Histor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ichardson, J., M. Krzyzanowski, D. Machin & R. Wodak. 2013. *Advance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 London: Routledge.

Shi-xu. 2009. Reconstructing Eastern paradigms of discourse studies [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1):29-48.

Smith, L. 2006. *Uses of Heritage* [M]. London: Routledge.

Waterton, E. 2009. Sights of sites: Picturing heritage, power and exclusion [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1):37-56.

Waterton, E. 2010. *Politics, Policy and the Discourses of Heritage in Britain*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Waterton, E., L. Smith & G. Campbell. 2006. The utility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heritage studies: The *Burra Charter* and so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4):339-355.

Zhang, H., C. Paul, Y. He & J. Wen. 2011. Critique across cultures: Some questions for CDA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95-107.

收稿日期 2015-03-17

作者简介:侯松,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批评话语分析,文化遗产,中西文化比较。吴宗杰,教授,博导。研究方向:批评话语分析,跨文化研究,文化遗产与空间叙述。

(责任编辑 杨波)